

老龄化与社会养老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路径分析*

杨华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在中国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发展、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的背景下,为避免学者和政府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高估,该文分析了养老对生育的反作用,即老龄化和社会养老对生育的影响路径。该文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在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的前提下,给出养老的低生育路径,其包括两个方面:一、对于国家和家庭,人口世代更迭下不断加深的老龄化引致老年抚养比上升,在不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下,家庭和社会养老支出递增,逐步挤占了生育资源,降低了生育水平。二、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降低了养老的家庭收益,使得生育的家庭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城镇化下生育成本的持续上扬且由家庭承担,使得家庭生育行为存在正外部性,故而家庭选择少生或者不生,最终导致家庭决策的生育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提醒相关学者和决策层关注养老对生育影响的维度,重视老龄化和养老制度改革对生育政策效应的反作用,以在社会养老体制下应对快速发展的养老潮。为避免养老对全面二孩政策产生的负面效应,决策层要尽快出台与生育政策与养老制度同时实施的配套政策,如生育补贴与规模化养老等。

关键词:生育;社会养老保险;老龄化;正外部性;婴儿潮;生育权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21)102-0085-08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最近研究生育与养老关系的重点集中在生育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对养老以及社会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上,如 Kimball(1987)、Hori 和 Kanaya(1989)认为生育存在养老功能,Pei 和 Pillai(1999)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对老年人口的代际支持水平;桂世勋(2008)、孙博等(2011)、史佳颖等(2013)、李菁昭 and 严佳敏(2014)、于洪和曾益等(2015)、骆正清等(2015)以及张心洁等(2016)等学者普遍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可以有效地降低未来社会抚养比,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但是反过来,研究养老以及养老政策对生育与生育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研究养老对生育政策的反作用,养老以及养老政策是否对以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存在削弱作用的文献还较少。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会使我们低估和高估全面二孩政策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作用,进而也使决策层忽略养老以及养老

政策对生育政策效应的反作用。特别在全面二孩时代,养老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如果养老制度改革与全面二孩政策在应对未来老龄化趋势上存在冲突和抵消,怎么办,同时,养老以及养老政策到底如何影响生育呢?

虽然 Barro 和 Becker(1988)、Cigno 和 Rosati(1992)、Werding(2006)、Ehrlich 和 Kim(2007)、周立群和周晓波(2016)以及穆光宗和茆长宝(2017)等学者发现,在某种条件下,老龄化的提高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扩张会对生育水平造成负面的影响;Zhang(1995)、Zhang 和 Zhang(2004)、沈燕(2010)以及刘子兰等(2015)从实证上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发现。但是对养老如何促使低生育形成,特别从老龄化对生育资源挤占和社会养老外部化生育收益的角度探讨低生育形成的研究还是不多,且不够系统和深入。这使得学者在破解低生育问题的制度设计上,忽略了养老这个维度,因而出台的走出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效力不足。基于多数学者关于养老会对生育产生负面影响的共识,本文从养老的维度——包括老龄化和社会养老,来探讨当前社会语境下,老龄化下引致的老年抚养比增加为何会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社会养老是如何通过外部化生育的收益,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并采用理论模型加以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如何破解养老

收稿日期:2020-11-23

作者简介:杨华磊,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口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E-mail:home@zuel.edu.cn

* 本文受教育部社科一般项目“60后婴儿潮退出劳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模拟与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YJC790167)资助。

对低生育产生反方向影响的机制,进而提高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实现家庭决策的最优生育水平等于社会最优决策的生育水平。

2 低生育的老龄化路径

2.1 老龄化与低生育的唯象关系

如果老龄化与低生育形成之间有一条路径,并且这条路径是重要且不可以忽略的,那表征老龄化指标的数据至少与表征生育水平指标的数据在图形上表现出反向的趋势。在此用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opr 代表老龄化程度;考虑到当前生育水平究竟为多少争议太多,以及每次人口普查造成生育水平的不连续性,在此用出生率 br 近似表征生育水平。考虑到 2010 年以后,从双独二孩政策到单独二孩政策,再到全面二孩政策,生育政策调整过于频繁,生育政策造成出生率较大的波动,进而导致生育政策对出生率影响较大,不利于观察老龄化与生育水平的关系,所以在此选择 2010 年的出生率和老龄化水平。初始时点选择为 90 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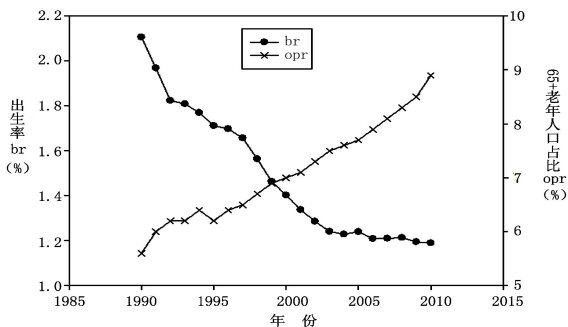


图 1 1990-2010 年间的出生率与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 1 可以看出,其一,在 1990-2010 年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 1990 年间的 5.7% 上升到 2010 年的 9%;与此同时,中国的出生率从 1990 年的 2.1% 左右下降到 2010 年的 1.2% 左右。其二,从数据所呈现的唯象关系来看,老龄化水平与表征为生育水平的出生率基本上呈现反向的关系,即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出生率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现在问,那老龄化通过何种路径影响生育水平呢? 其间的路径是什么。

2.2 低生育的老龄化路径

老龄化问题实际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也是

出生人口数量在时间轴上的分布,以前出生的人口相对较多,后来出生的人口较少,进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较高的人口占比逐渐增多,社会迎来了老龄化。以二战后为起点,由于长期的战乱,人口再生产紊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发展中国家纷纷建国,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通常战争以后人口会出现反弹与激增现象,发达国家和新建国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人口数量快速增加,随着战争后生育堆积或者被抑制力量的释放,出生率和生育水平缓慢下降,这种出生率的上升和下降交替形成了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如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迎来了婴儿潮世代(也即是婴儿潮世代)。如日的本团块世代(1945-1949),美国的 1946-1964 世代,中国的 60 后世代(1961-1972),韩国的 50 后出生高峰(1955-1963),德国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同样出现了婴儿潮,等等(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之后出生率下降。随着时间的继续演进,大约 15-20 年左右,当出生高峰或者婴儿潮一代进入婚配和生育年龄阶段,又会导致一个次生的出生高峰或者次生的婴儿潮,这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在时间中演进,进而导致出生率的波动,但是出生率的波幅越来越小。

老龄化对生育水平或者出生率的影响,实际上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生育水平或者出生率的影响,更进一步是过去的出生率或者生育水平对现在生育水平的影响。如果历史上或者 50-60 年前出生的人口过多,当这一部分劳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参与劳动生产商品和服务,同时又需要商品和服务,又没有多少储蓄或者没有上缴多少养老金,那规模较大的老年人口的赡养就落到了规模相对较小劳动人口一代人身上。如果劳动人口不减少自身的消费,同时未来伴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不降低每个老年人口的养老金支出水平,那对于家庭和社会,过大的老年人口必须占用更多的社会或者家庭资源。在不考虑借贷或者国际部门的情景下,在不降低单个老年人口支出和降低劳动人口自身消费的情景下,在养老是确定发生的事情,必须被动接受、无法选择以及生育还可以选择生或者不生,生多与生少的情景下,那伴随着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势必对生育资源产生挤占,降低生育水平。并且老龄化程度越深,对生育资源的压缩就越大。那伴随着未来

60后婴儿潮的退休,养老潮引致的快速老龄化,势必挤占对生育资源产生更大幅度的压缩和挤占。

为了说明老龄化对生育的挤占,在不存在借贷下,我们不妨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人口的工资是 w ,每年用于自身消费的部分为 c ;平均生育的孩子量为 n ,每个孩子的开支为 p ,则用于抚养孩子的支出为 np ;平均赡养 m 个老人,每个老年人口支出为 o ,则平均用于老年人口的支出为 mo ;剩余的用于储蓄 s ,则劳动人口的收入预算方程为 $w = c + s + np + mo$ (1)

从公式1可以看出,若每个劳动人口的工资固定不变,并且劳动人口不减少自己现在消费 c 和自己将来消费 s ,即劳动人口是理性的。考虑到养老金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难,在此假设对每个老年人口的支出水平 o 不变。则随着养老潮引致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果老年人口抚养比 m 的上升,则用于赡养孩子的支出,也就是生育资源 np 势必会出现下降,如果保证孩子的质量不下降,老龄化势必对生育水平 n 造成挤占。对上述公式变形得公式2,从公式2可以看出 n 与 m 呈现负向关系。 $n = (w - c - s) / p - (o/p)m$ (2)

总之,如今二战或者建国后出生人口较多的婴儿潮一代普遍进入退休年龄,迎来银色浪潮,老龄化不断上升,养老潮扑面而来。由于老龄化社会中养老负担过大,在现代社会活出自我的文化使得年轻人不进行节欲和老年人口开支很难降低的情景下,老龄化加深必然过多的占用社会资源,进而挤占生育资源,强化低生育或者降低出生人口质量。这就是老龄化引致的低生育路径。

2.3 破解老龄化对低生育形成的对策

目前中国平均退休年龄大约为55岁,在2015年左右,中国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最大婴儿潮世代开始整体进入退休年龄,社会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按照上述老龄化的低生育路径推断,未来由于养老负担的加大,养老将大幅度地挤占生育资源,促使生育水平下降^[12-14]。因此,随着养老潮在未来10-15年内到来,当前的养老模式——不管是家庭养老,抑或社会养老,势必导致养老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逐年加速上升。因为老龄化趋势必然带来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引擎——人口和资本红利的优势不断下降,这不可避免的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通过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升级来缓解2015-2030年间中国养老负担过大和财政收入增速趋缓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发挥作用,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也会伴随劳动力的老龄化及其数量的下降而受到阻碍。因此,未来社会的养老开支势必会过多占用社会资源,挤占生育资源。那么,如何在社会结构老龄化和社会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在八零后婴儿潮尚处于育龄年龄阶段,在中国尚存的10-15年的人口战略发展机遇期,以开拓性的制度创新弱化社会老龄化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的挤占呢?本文认为,主要的思路是降低养老成本和减少养老支出。前者在不降低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院,在集中供养老人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以遏制养老金开支的增长势头,弱化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后者可以采取逐步延迟退休的政策,推迟养老潮的到来,使得老龄化水平缓慢增加或者暂时不增加,亦即养老支出缓慢增加或者暂时不增加,进而实现在人口的战略机遇期减少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

2.3.1 推迟退休,减少养老开支

有效实施推迟养老的方案,即逐步延迟退休或者即时延迟方案,在人口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以使劳动人口缓慢减少甚至不减少,老年人口比例缓慢增加甚至不增加,进而推迟或削平社会的养老潮,弱化养老支出不断增加的压力,最终降低老龄化趋势下养老支出增长过快对生育资源的挤占效应。假如不实施延迟退休或者推迟养老的措施,甚至退一步讲,不推出逐步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的政策,老龄化趋势下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及其对生育资源的挤占效应,将对中国人口再生产形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2015年-2030年,中国80后婴儿潮还处在育龄年龄段内,此时施行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的方案,能大大的提高中国人口再生产的能力,进而为释放出中国生育水平增长的红利再争取了10-15年的战略机遇期。2015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世代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期,养老潮必将加速到来,老龄化水平将急剧提高;此时恰逢中国从2015年开始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放宽了生育管控,如果形成老龄化对生育资源的挤占效应,在未来10-15年内,老龄化趋势引致的养老支出的快速增加,不利于社会生育增长和人口再生产,进而影响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在2015-2030年间,中国的80

后婴儿潮还处在育龄年龄段内,一旦80后婴儿潮过了育龄年龄段,即使生育水平重新达到2.0,由于90后和00后是中国的出生低谷世代、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原因,整体社会生育的数量也不会高。因此,在未来10-15年之内,在全面二孩实施的重要期间,应尽量规避老龄化对生育资源的挤占,防止老龄化对全面二孩政策作用的削弱。

2.3.2 规模化养老,降低养老成本

延迟退休只不过是推迟养老或者使得养老支出平缓的增长,在人口战略机遇期避免养老支出快速增长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但并不能有效降低社会的整体养老支出,因为人口战略机遇期过后,人口老龄化依然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何避免短期甚至长期的老龄化趋势下养老支出过大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呢?在社会结构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绝对增加的背景下,通过规模化的养老服务,能够在不降低单个老年人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水平下,降低单个老年人的养老成本,进而遏制整体养老支出的增长速度,避免养老支出过大对生育资源的挤占。通过建立养老院,进行规模化经营将老年人集中养老,同时招聘专业的养老服务和管理人员,提供标准化养老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发挥老年人之间互助协作,实现集体养老的规模效应(传统一个家庭一个子女服务二个老年人,现在一个专业服务员拿一份工资,可以同时给十个老人,甚至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类似一个家庭教师只能服务一个学生,而一个公共教师,可以服务四十多个学生,哪个效率高,可见一斑)。最终,通过建立养老院,为老年人口提供高质量的更专业化、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大大提高社会养老的生产率水平,降低了单个老人的赡养成本,进而降低社会的养老成本和公共财政支出;同时,使家庭从养老中解放出来,节省了大量的赡养老人的时间,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使得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时间用于生育和抚养子女,并为将来家庭养老进行投资储蓄,实现生育和养老的双重目标。

3 低生育的社会养老保险路径

3.1 社会养老保险与低生育的唯象关系

首先界定何为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是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

劳动能力而退出劳动岗位后而建立的一种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样为说明社会养老保险与低生育的唯象关系,我们需要把测量社会养老保险程度的指标与表征生育水平指标的数据在同一张图中绘出。在此选用两个指标衡量社会养老保险开展的程度:其一,历年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cbr ,如果此比例越高,说明社会养老翻盖的范围也越广;其二,如果历年社会养老保险开支占总产出的比例 pgr 越高,同样说明社会养老开展的程度也就越深。对于表征生育水平的指标,在此同样选择出生率 br ,而出生率的时间区间也就为1990-2010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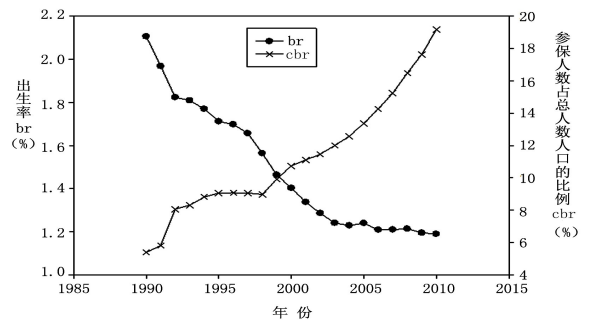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0年间出生率与参保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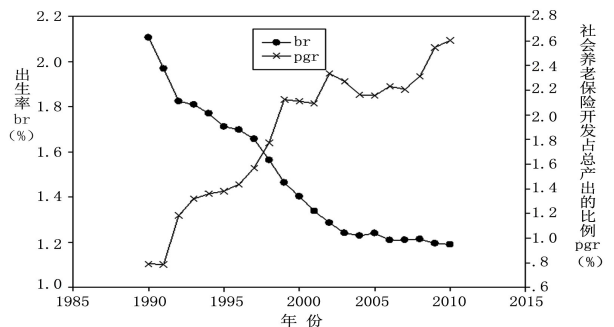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0年间出生率与社会养老保险开支占比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其一,在1990-201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1990-2010年间衡量社会养老保险程度的参保率与养老保险开支占总产出的比例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前者从1990年的5%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19%左右;后者从1990年的0.9%上升到2010年的2.6%。其二,基本上出生率和社会养老保险开展程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那社会养老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低生育呢?

3.2 低生育的社会养老保险路径

只有生育,才能养老,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下,生育的成本主要依赖农产品,农产品主要依赖土地,而在古代土地具有公共属性,所以生育的成本社会化且很低。与此同时,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下养老大多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特别是家庭的子女养老。所以生孩子直接和养老收益挂钩,加上农业社会下的宗法制度,孩子的不回报高,且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也较少,使得生育的收益不外溢且很高。在生育成本社会化且高于家庭成本,社会财富流从孩子流向父母,家庭的生育收益又大于家庭的生育成本,生育行为具有负外部性(社会成本大于家庭收益大于家庭成本),使得很多民众选择多生育,进而产生了多子多福的社会文化。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开展,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对工业品和服务品的需求逐年增大,进而生育成本逐年上升且很高;与此同时,原先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引致养老制度的变迁,从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如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使得系统的家庭生育不再直接和养老收益挂钩,社会养老掩盖了生育和养老之间的关系,实际社会养老依然依赖生育,社会养老和社会生育挂钩。此时养老的社会化,必然把生育推向社会,使得生育社会化,而生育的社会化使得生育成为一个公共供给品,但是国家还没有达到在培养皿中培养孩子,即孩子的国家供给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育的社会化滞后养老的社会化,引致孩子抚养成本有家庭承担,但是收益是属于社会的,即孩子公平品私人供给的悲剧(Groezen et. al, 2003; Schoonbroodt 和 Tertilt, 2014)。

总之,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工业社会的推进,社会养老、储蓄养老以及孩子不养老使得生育的收益发生外溢且逐步降低;与此同时,城镇化下生育成本过度依赖工业品和服务品,生育成本逐年上升且更多有家庭承担,生育行为具有了正外部性(社会收益大于家庭成本大于家庭收益),引致很多人在养老上搭便车,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社会的生育水平逐渐下降。

同样为了更容易理解社会养老开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此建立家庭决策的简单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加以解释。假设市场均衡和要素充分流动,因

此利率 r 和工资 w 是固定的。家庭决策下存在一个代表性劳动人口,决策如何把年轻时候的收入最优的用在生育、消费、储蓄以及赡养老人上以获得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这个代表性劳动人口一生包括两期:劳动期间与不劳动的年老期间。劳动期间参与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并把这些工资收入用于消费、储蓄、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年老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消费来自年轻时候的储蓄和当期劳动人口对其的赡养支出。代表性劳动人口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包括劳动期间消费和生育带来的效用,以及年老时候消费带来的效用,目标函数采用对数形式,则有 $U_t = \log c_t + \beta \log c_{t+1} + \gamma \log n_t \dots\dots\dots (3)$

每期劳动人口的工资为 w , 自身消费和未来消费储蓄的份额分别为 c_t 和 s_t ; 抚养孩子数量为 n_t , 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为 p , 总抚养孩子支出为 $n_t p$; 抚养老年人口支出为 o 。则代表性劳动人口在年轻时候面临的约束方程为 $w_t = c_t + s_t + o + n_t p \dots\dots (4)$

第二期劳动人口变成老人, 劳动人口获得消费 c_{t+1} 包括上一期的储蓄收益 $s_t(1 + r_{t+1})$ 和此期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赡养 $n_t o$, 则劳动人口年老时候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_{t+1} = s_t(1 + r_{t+1}) + n_t o \dots\dots (5)$

在上述预算约束下, 每期劳动人口面临的规划是, 如何规划每期的工资在消费、储蓄、生育以及赡养老人上, 以获得一生的效用最大? 根据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考虑到工资 w 和利率 r 的固定, 最终求出使得劳动人口效用最大化时候的生育水平 n^* , 其等于 $n^* = \gamma(w - o) / [(1 + \beta + \gamma)p - \gamma o / (1 + r)] \dots\dots\dots (6)$

社会养老的开展, 在生育成本不变下, 实际上就是降低了生育的收益, 即降低每期的代际支持 o 。根据均衡的生育率, 我们发现, 在 $w > 1$ 的条件下, 则有 $\partial n^* / \partial o > 0$ 成立, 这意味着如果对老年人口的代际支持水平提高, 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也会越高。如果我们对老年人口的代际支持水平降低, 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也越低。在通常 $w > 1$ 的情景下, 根据家庭决策下的均衡生育水平 n^* 可以看出, 社会养老的开展通过降低 o , 的确降低了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 n^* 。

4 破解社会养老保险对低生育形成的对策

4.1 生育补贴, 社会化生育成本

考虑到未来城镇化的继续推进, 社会养老保险

覆盖面和程度不断加深,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回归家庭养老;与此同时,社会技术和伦理的缺失使得我们也不可能在未来,特别未来10-20年内,实现生育的社会化。那生育收益因为社会养老的开展不可能避免外溢,生育成本又必须有家庭承担且生育成本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而不断高涨,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那既然社会养老无法逆转,生育不能社会化,那我们能否设计一种制度,使得生育的成本间接的社会化。进而规避生育行为的外部性,提高社会福利,进而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生育补贴。我们如何进行生育补贴呢?生育补贴的费用来自哪里呢?按照生育正外部性,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理论上,理应每个家庭都平均按照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生育。有资本生产比较优势的家庭,即使你不生,你也必须相应承担生育孩子的成本,这样生育行为中才不存在扭曲。现实中,不生或者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家庭,没有承担或者少承担了生育的成本,但是生育的收益是社会共享的,引致生育存在扭曲。有资本比较优势的家庭,不生或者少生,同时不承担按照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进行生育的义务,有人口再生产比较优势的家庭,因为生育收益被大家共享,引致其生育水平也呈现下降,进而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为扭转这种趋势,每个家庭必须按照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生育,如果不生育,也必须相应承担按照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生育的成本,即对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社会赡养税。社会赡养税对主观少生或者不生的家庭征收,因为他们老年时被社会孩子赡养,年轻时候没有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在年老时候搭了社会孩子的养老便车。然后把这些征收的社会赡养税用于补贴多生或者高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家庭,最终通过对少生或者不生的家庭征收社会赡养税,补贴多生的家庭,在社会养老无法逆转下,实现生育成本的间接社会化,最终提高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实现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吻合。

4.2 科斯手段,不生育权交易

在社会养老保险不断推进和生育成本不断上扬下,生育行为存在了正外部性,为解决生育的正外部性问题,在每个家庭平均承担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生育数量或者生育成本,有人口再生产比较优势的家庭多生,同时得到生育补贴;有资本比较优势的家

庭少生,但按照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缺口上缴社会赡养税。在理论上,这样是完美的,可以解决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但是生育补贴的发放和生育赡养税的征收,存在很大的行政和管理成本,如税如何设计和征收,补贴如何设计和发放,这大大降低此制度的效率。现在如何我们采取科斯的赋予产权的手段,把不生育权赋予国家,生育权赋予家庭,同样每个家庭理应按照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进行生育。如果你对资本生产更有优势,你可以选择不生育,但是这种不生育权只能转让,不能放弃。即你必须在市场中找到生育的家庭,被转让的家庭必须承担相应的生育义务,当然你也必须给接手你不生育权的家庭一定的费用,此费用等价于你不生育给你征收的社会赡养税,给多生育家庭的补贴,这相比单纯的征收税和补贴,少了政府参与和行政成本,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样通过不生育权的交易,充分实现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分工,让有人口再生产的家庭多生,让有资本再生产比较优势的家庭少生,进而提高了社会生育水平和社会福利。当然关于这种制度,在发达国家没有,在落后国家也没有,所以可以尝试做一些试点,然后成熟之后再推出。

5 结束语

通过分析发现,养老的低生育路径表现为,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未来老龄化水平逐年上升,在不可能降低养老金水平以及养老无法选择的情景下,由于老年抚养比上升,老龄化将挤占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资源,使得用于生育的资源降低,进而降低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其二,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生育成本上涨变得不可避免,随着社会养老和储蓄养老的开展,使得养老和生育收益社会化,与此同时生育还是在家庭进行,生育成本由家庭承担,使得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导致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在全面二孩时代,为使得民众按照政策生育,为破解低生育形成的养老维度,针对老龄化对低生育形成的影响,特别是未来10-15年内未来60后养老潮退休时期,我们提出通过推迟退休和规模化养老,在不降低养老产品和服务下,降低养老支出和成本,减轻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为人口发展争取10-15年的战略机遇期。为破解社会养老引致的生育行为正外部性,我们提出通过生育补贴和不生育权交易,优化社会化

生育的家庭成本,使得每个家庭都可以按照社会最优的生育水平生育或者承担生育成本,最终达到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等于社会最优的生育水平。

本文意义表现为如下:在学理上,梳理了研究养老、养老制度对生育影响的文献,并给出了养老中的老龄化和社会养老对低生育形成的影响机制,给以后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提供一个文献素材和机制框架,当然也给出学者理解低生育形成的另一个视角。在实践中,作者尝试设计一些制度去减轻养老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使得学者和决策层认识到,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与未来的养老制度改革在应对老龄化的效应是存在冲突和抵消的,特别是未来老龄化和养老制度改革会削弱当前看好的全面二孩政策在释放生育力量和应对老龄化上的效果,正如穆光宗和和茆长宝(2017)认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相互强化的,社会养老的深化会削弱生育水平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上述研究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未来老龄化不断加深和社会养老不断推进的中国,学者和决策层要关注养老对生育的影响,特别是老龄化挤占生育资源和社会养老外部化生育收益这一养老维度对生育的影响,同时尽快研究、制定、试点以及推行与生育政策和养老制度改革同时进行的配套政策,如规模化养老和生育补贴等制度,避免养老未来对生育资源的挤占,最终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Barro R J, Becker G S. A Re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Fertili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03.
- [2] Cigno A, Rosati F C. Jointly determined saving and fertility behaviour: Theory, and estimates for Germany, Italy, UK and USA[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0.
- [3] Ehrlich I, Kim J.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988, 40.
- [4] Hori H, Kanaya S. Utility functionals with nonpaternalistic intergenerational altruism[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9, 49.
- [5] Groezen B, Leers T, Meijdam L.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 pensions and child allowances as siamese twin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
- [6] Kimball M. Making sense of two-sided altruism[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7, 20.
- [7] Pei X, Pillai V. Old age support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1999, 49.
- [8] Rosati F. Social security in a non-altruistic model with uncertain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0.
- [9] Schoonbroodt A, Tertilt M. Property rights and efficiency in OLG model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4, 150.
- [10] Werding M. Implicit Pension Debt and the Role of Public Pensions for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 Assessment for Germany[J]. Discussion Paper. 2006, 12.
- [11] Zhang J.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58.
- [12] Zhang J, Zhang J. How does social secur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 17.
- [13] 桂世勋. 关于调整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 2.
- [14] 刘晶. 子女数对农村高龄老人养老及生活状况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S1).
- [15] 刘子兰, 陈一格, 沈毓赞. 养老社会保险与生育率: 基于 OLG 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4.
- [16] 孙博, 董克用, 唐远志. 生育政策调整对基本养老金缺口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 2.
- [17] 史佳颖, 胡耀岭, 原新. 缓解老龄化: 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有效吗[J]. 人口学刊, 2013, 3.
- [18] 沈燕. 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19] 于洪, 曾益. 退休年龄、生育政策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J]. 财经研究, 2011, 6.
- [20] 周立群, 周晓波.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 11.
- [21] 杨华磊. 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生育 2.0 时代下如何释放生育力量[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6, 7.

Influence of Aging and Social Pension on Fertility Level

YANG Hual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Province 43007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n increasingly aging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ystem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in order to avoid the scholars' and the government's overestim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unteraction of elderly care on birth, that is, the effect of aging and social provision to the elderly on birth.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ext analysis,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birth in the family, we analyze the effect of elderly care on low birth rate, which includes two aspects: First,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family, with the aging caused by generational change, without reducing the pension replacement rate, the family and social pension expenditure increases, which gradually squeezes fertility resources, and reduces the fertility level.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old-age insurance reduces the family's income for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Family income for fertility is lower than social income. Moreover, urbanization makes the fertility cost rise and the family will bear most of it. Therefore, many families choose to have fewer children or not to give birth, which results in the fact that family decision-making fertility level is lower than the social optimal fertility leve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tudy is to make scholars and decision-makers aware of the dimens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elderly care on fertility, focusing on the counteraction of aging and elderly care system reform on fertility policy. In order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lderly care on the two-child policy, decision-makers should research and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as soon as possible, such as maternity subsidies and large-scale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 Words: fertility;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aging; positive externalities; baby boom; fertility right